

政治、地域與家族—— 宋元時期四明士族的衰替

黃寬重*

本文從地域社會的角度來探討宋元時期四明地區士人家族的衰替現象。在宋代，科舉出仕是家族興起的重要關鍵，藉由在朝為官的機會，得以提攜同鄉後進，在政治上互相援引、凝聚力量。為了維持家族的競爭優勢，同時在地方上積極擴展勢力，藉由產業的經營，厚植本身的經濟實力；透過地方事務的參與，來提升家族的聲望，如建設鄉里、舉辦慈善公益等活動，更進一步發展出地方的經濟互助體系「鄉曲義莊」，這些都是發展與鞏固家族勢力的重要方式。透過族際間的團結與合作，四明的士族共同塑造出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從此一角度來看，士族的興起，也是四明地方興起的過程。嘉定以後，四明士族在政治與學術上的表現都達到了高峰，卻也開始走向分化與對立，首先是政治上的歧異，慶元黨禁開始了朝中四明人的對立，隨著蒙古的崛起，在對金和戰的問題上，也成為四明士族之間分裂的主要因素。這一連串的政爭，使得四明士族之間緊密的關係出現裂痕，家族與宗族內部漸漸失和。導致家族衰敗的內部因素，則是社會風氣的轉移與子弟興趣的轉變，由於長期處於承平時代之久居富裕生活，使得後代子弟不再致力於追求科舉功名，轉而發展藝文、宗教等文化事業。這種關係到個人意願與能力的內在因素，是引發家族衰敗的深層因素。經過這些衝擊，四明士族在入元以前，在政治與地方上的影響力已日益衰退。

關鍵詞：四明 地域文化 士人家族 鄉曲義莊 慶元黨禁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國立中興大學萬年人文講座教授

前言

唐代以降，科舉成為中國國家拔擢人才與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徑，不僅加強了皇帝的權威，改變了中古門第社會的傳統，更是個人與家族發展與否的重要關鍵指標；與之相關的教育、經濟、婚姻、人際網絡等因素，也對個人與家族的興替造成影響。

到宋代，科舉擢才更為公開而且競爭激烈，不論個人或家族，均難如中古時代常保繁盛。已崛起的家族，為維持原有優勢，除積極經營產業、教育子弟外，更藉由參與地方公益、慈善活動，以維繫地方聲望；但即便如此，面對科舉社會的現實環境，家道仍會受到經濟環境、人際關係的變化而有所改變。諺語「富不過三代」所反映的家道衰敗陵夷之易，和各家族為維繫家業榮景，極力塑造有利家族發展條件的努力，相互交織在自唐迄今的歷史發展中，成為一千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寫照，個人於此在《宋代的家族與社會》一書的結論中，已有所闡述，不再贅論。¹

在個人過去的研究中，曾以累代中舉仕宦的士人家族為個案，從科舉、經濟、教育、婚姻、人際網絡等角度，分別分析了宋代明州地區數個士人家族的興衰過程及原因；本文則希望在此研究基礎上，掌握長時期地區士族之間的關係與變化，以探討四明地區「一群」士人家族間的互動及其對個別家族和地域的影響。相對於一般討論近世士人家族的研究，本文試圖從家族衰替的角度探討社會流動與精英階層的議題，而非著重於家族延續的面向。

以「衰替」為研究家族的切入點，有兩種考量：首先，對衰替過

¹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頁 251-270。

程的研究，一方面從反面顯示維持家族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則顯示「實際」的發展結果。再者，家族衰替的現象使我們注意到：以統計數字為主的「社會流動」，並無法說明精英階層內部的實際流動情形，以及個案與整體描述間的差異與斷裂。由於受到對於精英階層之定義的影響，目前學界對於宋代的「社會流動」仍未有定論，但即便是以最寬的定義(如 Robert P. Hymes，對於此一定義的檢討，見李弘祺書評)，來強調精英的延續性，也並不意味精英階層是靜止不動的，而僅是針對科舉的快速流動印象加以修正；相對於科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劇烈提升，通過精英階層的上升過程則是較為曲折、緩慢的流動而已。

在宋代，家族的發展脈絡有不同的途徑，也未必有興衰之分，但科舉既為個人與家族發展的重要關鍵，中舉與仕宦不僅使個人成為地方縉紳，連帶也讓家族成為地方上具有名望的士族。然而，除了家族成員的科舉、仕途表現及對地方事務的參與外，士人家族的榮枯尚取決於家族成員興趣的轉變、家風的變化、家族內外人際關係的改變，以及政治力的介入等等因素。從表面上看，士族成員的不第或無意仕宦，雖然只是淡出政壇，未必影響家族在地方上的角色，但就士人家族的發展而言，這種累代無人中舉或退出仕途的現象，不論在族內或鄉里間，與昔日的榮景相較，往往都被視為家道不振，正是本文所指的「衰替」。不過，目前學界對造成士族衰替的研究與討論均嫌不足，以致影響了對家族發展的整體性觀察，這也是本文將「衰替」作為關注重點的原因。

此外，歷史學界討論中國歷史問題時，仍受朝代框架的限制。此一現象，或與長期以來歷史教育與研究側重斷代，以致難以跳脫朝代的思維，從長期發展去掌握歷史變化有關。先前我的研究偏重幾個重要士族在南宋的勃興，及經由合作，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社會文化的

現象，而研究元代四明家族的學者，則看到這些家族在元代被一些新興的家族取代，藉以說明蒙元政權的建立，是四明地區家族與社會變化重要的關鍵；²這樣的研究顯然都有朝代的侷限性。其實，若能突破斷代的限制，同時擺脫個別家族的思考，從更寬廣的地域社會的層面來探討，相信會有不同的看法。有鑑於此，本文嘗試將研究時段拉長，並透過士人家族子弟回視前代榮景的眼光，對四明地區的士人家族發展，進行跨斷代的研究。

過去學界對家族的研究，多著重於各家族如何鞏固其地方勢力，以延續其精英地位；但相對地，也正因士人家族是地方社會的精英階層，其興衰同樣牽動著地方的發展，而這發展更是地方家族間彼此互動的結果，而非單一家族的表現。因此，研究精英階層內部的流動情形，不僅是理解社會流動的關鍵，也是探討地方社會權力組成並影響地方發展的重要線索。除此之外，更由於四明士族長期在南宋政局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與朝政的關係特別緊密，如果將這些家族與地域社會放在歷史發展脈絡中去理解，更能將家族的興衰、精英階層內部的流動，與地方社會結構三者間的變化密切結合，將更有助於瞭解地域社會的發展與變化及呈現整體歷史的發展面貌。

一、四明士族的興起與文化形塑

宋代四明家族中，名望甚盛的大家族包括史家、樓家、兩袁家、汪家、高家和舒家等六、七個家族，這方面的研究，包括本人、Richard L. Davis(戴仁柱)、石田肇、包偉民、伊原弘、Linda A. Walton(萬安玲)等人的論文，都有所探討。綜合這些研究，吾人可以對南宋四明家族

² 李家豪，〈沒落或再生——論元代四明地區的士人與家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8）。

的崛起，歸納出幾個較具一致性的看法，而這一看法和宋代其他地區士人家族崛興的現象相當一致：科舉考試，不僅是改變個人命運的起點，也是一個家族崛起的重要關鍵，它像磁鐵般，吸引著有意改變命運的家族邁向科舉。

教育是通往科舉考試的必要途徑，但需要龐大經費及長期投資。因此，從家族的發展策略而言，一個家族經過幾代努力經營，達到小康之境以後，多經由安排，讓家中一、二名聰慧子弟到家塾、私塾、書院，乃至州縣官學接受教育。從地域社會的角度而言，這些教育的場域，讓鄉里或族人中年齡相近的幼童，因學習而建立了深厚的鄉黨同學情誼，一旦成為進士，這些曾經共學的士人，很容易因同窗兼鄉誼關係形成集體力量，在仕途上互為奧援。而這種個人之間的結合，不僅有助於個別家族的發展，也促進了地方集體的興盛。就四明而言，家族興起的同時，也是地方興起的過程。像北宋中期，樓郁在四明所教的學生舒亶、袁覿、羅適、豐稷等人，即共同為四明士人打開邁向政治發展的途徑。南宋四明士子之間的關係，更為明顯，像汪大猷與史浩是同鄉、同學，又是同科進士，關係十分密切。樓鑰說：「(汪大猷)其在行朝，史文惠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獎最深，魏成公少小相處如兄弟，蔣丞相同為宮僚，王侍御伯庠實為姻家，前後同時。」³這種同鄉之誼，表現出來的即是提攜後進，或在政壇上互相扶持、支援。史浩辭官時，向孝宗推薦了袁燮、楊簡等四明士人，全祖望稱讚史浩「吾鄉史氏，一門五宰執，忠定雖以阻恢復事，為梅溪所糾，然其立朝能力薦賢者。乾淳而後，朱、陸、陳、呂、楊、舒諸公，皆為所羅，而使諸子與楊、舒諸公遊，尤可敬」。⁴此外，汪大猷推薦過錢象祖、

³ 樓鑰，《攻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刊正編本），卷88，〈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頁18上。

⁴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卷28，〈跋宋史

史彌大、潘時、沈銖、鄭鏐等五位四明同鄉，⁵樓鑰也向寧宗薦舉楊簡、高似孫、馮端方、樓昉，⁶這是四明士人在寧宗朝形成群體力量，影響朝政，而被視為當時最具實力之地域的主要因素。

登上進士的士人，為了穩固家族基業，一面以自己經歷舉業的經驗，透過教育，培育子弟，一面經營產業，厚植經濟實力，甚至成立家族義莊，以維持競爭優勢，經由任職、官歷，建立多元的人際關係，並藉由婚姻的締結，開展更堅實的人際網絡。經過一、二代的努力，幸運者便能開創個人的政治高峰，同時讓家族成為地方名門。此後，由於蔭補的保障和婚姻、人際關係的擴展，使家族發展趨於穩定，如此一來則能與新興的挑戰者，保持一定的競爭距離。這些家族在地方上既已累積了豐沛的人脈與社會資源，自然成為當地實至名歸的名門望族。⁷而從地域社會的角度，這些名門望族正是影響地方社會發展的主要骨架。

個別士人或家族的崛起，固然需要靠個人的努力與際遇，但要維持競爭優勢，更需要與各方合作，援引各種資源，才能成功。因此，參與鄉里的文化與公益活動，乃至慈善救濟事務，都是培養個人乃至家族聲望的重要手段，而鄉里公共活動的推動，則讓各個家族由重視自身發展的經營策略，走向與鄰里共謀發展的社會活動，也因此形成了具在地特色的地域文化。

宋代士人在追求個人事業發展的同時，也活躍於鄉里社會。這一

史浩傳後》，頁 1054。

⁵ 樓鑰，《攻媿集》，卷 88，〈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頁 19。

⁶ 樓鑰，《攻媿集》，卷 31，〈舉楊簡劉仲光狀〉、〈除顯謨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舉馮端方江疇樓昉狀〉。

⁷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頁 251-256。

點從鄧小南教授討論宋代蘇州士人家族交遊圈的論文，及本人研究有關四明、江西的家族個案中，都可以看出來。⁸在南宋，由於對金和戰及政治路線經常變動，進士錄取名額多而官僚員額有限，使得官員留在鄉里待闕或辭官歸鄉者增多，高官也多因政見不同，難以久任高位，而提早告老返鄉。四明人中，像高閌、史浩、汪思溫、汪大猷、樓鑰等人，都是長期居鄉。他們鄉居期間，不免有因私而干預地方事務的事例，如史彌正奉祠就養後，仍介入明州事務，以致宋廷在制書中譴責史彌正「爾奉祠就養，宜無預于公府。知篤葭莩之好，而忘瓜李之嫌」而被罷祠宮之官，⁹以及錢端禮與民爭產事。然而更多的是透過個人乃至家族間的合作，推動具有特色的文化與社會活動。如史浩在淳熙八年(1181)告老返鄉之後，曾延致沈煥居竹溪，楊簡講學於碧沚，袁燮、舒璘和呂祖儉等人也一齊帶動講學辯論之風，讓四明成為南宋教育學術活動中心之一。史浩、汪大猷則先後推動以怡情遊賞、賦詩唱和為主的詩社如：五老會、八老會，乃至真率之集等，他們同時透過聯誼，達成關懷、推動鄉里文化活動，興復以尊老序齒，具有團結士人及建立集體意識的鄉飲酒禮。元人程端禮說：「鄉飲酒禮，……廢墜之久，在宋淳化間，四明獨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紹興以後，賢守相濟繼，訂禮益精，且立恆產，以供經費。風俗之美、文獻之盛，遂甲他郡」。¹⁰這些活動能行之長遠，固然需要地方長官

⁸ 鄧小南，〈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國學研究》，3(北京，1995)，頁463-466；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

⁹ 樓鑰，《攻媿集》，卷34，〈直敷文閣史彌正為高燮奏厲雄公事落職罷宮觀〉，頁20。

¹⁰ 程端禮，《畏齋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四明叢書本)，卷3，〈慶元鄉飲小錄序〉，頁4下-5上。參見山口智哉，〈宋代鄉飲酒禮考——儀禮空間としてみた人的結合の「場」〉，《史學研究》，241(廣島，2003.7)，頁66-96。

的支持，但要持續舉行，形成文化傳統，則像王伯庠、汪大猷、何炳、陳卓等四明重要家族的成員長期推動，及鄉人的積極參與，更為關鍵。

四明士族除了個別家族參與修建州縣學校、造橋鋪路，乃至救濟慈善活動等地方公共建設外，更進一步組成超越家族義莊、具有地域色彩的「鄉曲義莊」。四明士族之間，得利於因同學、同事乃至婚姻關係逐步建立的綿密人際網絡，只要有人從中鼓吹發起，就極易從個別士人家族的行動，形成集體力量。四明的鄉曲義莊即是此類具有集體意義的社會福利措施。這個構想由史浩先在紹興府推行，他的同鄉好友沈煥贊同此一理念，建議在家鄉實行，以砥礪四明士人，建立廉能政治。經由集體力量，建立超越個別家族的地方經濟互助體系，並透過制度化的組織，常態持久地運作，以幫助四明地區窮困的知識份子和官僚子弟，來達成崇尚廉恥，培養廉能官僚的目的。鄉曲義莊關懷照顧的層面，是從個別家族，延伸到整個鄉里的士人階層。

史浩的意見得到同輩好友汪大猷、沈煥的積極支持，於是展開勸募、制訂規章以及實際執行的工作。鄉曲義莊由四明士人如汪大猷、史浩、樓鑰、沈煥、袁樞、高文善結合當地富人如邊氏等共同籌劃推動。其以民間為主、官府為輔的運作模式，是四明士人及其家族走出各自的藩籬，經由合作而創下的重要舉措。在鄉曲義莊的推動過程中，除了史浩領導外，其他參與者也都恰如其分的扮演應有的角色，顯然是成功的要因。然而，從理念的提出，到規劃運作、付諸執行，前後歷時十餘年，顯示在當時社會環境下，要創造突破個別家族的集體成果，是需要費時溝通、捐棄成見，並非一蹴可及。¹¹從這裡，我

¹¹ 梁庚堯，〈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213-237；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頁 124-131。

們看到南宋中期以前，四明家族的興起與四明地區的發展相為表裡，相輔相成，這和地區家族之間的合作，及四明政治文化的集體表現是一致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四明士人家族在南宋崛起後，經由教育、婚姻，乃至鄉里情誼等方式，讓士人官僚之間相互合作援引，形成集體力量，這種力量不僅在政壇上互相扶持，即便辭官返鄉，仍一齊攜手，共同關懷鄉里。他們從個別人物或家族出發，不論對慈善救濟、鄉里建設，或詩社、鄉飲酒禮，乃至鄉曲義莊等地域性的公共事務，都展現了群體合作的成果。這樣的成績，大約在慶元黨禁之前，展現出來，使四明成為全國最富特色的地方。這些名門望族，不論在政治與學術，乃至文化思想的表現上，都在此時達於顛峰，形成四明士族群體表現的最佳時期。

從嘉定以後，四明士族中，個別士人或家族，在政治乃至學術的表現，都有再創高峰之勢。特別是史家，在史浩之後，有史彌遠、史嵩之叔姪，分別在寧、理二朝任相，壟斷朝政，其政治影響力更勝於史浩之於孝宗。袁燮、袁甫父子在寧、理二代，不論政治與學術的表現，也遠超過其父祖輩。同樣地，高氏家族中，高文虎、高似孫的政治影響力也較高閎、高開為重。不過，從整個地域社會的角度來看，四明士族開始走向分化，乃至對立，家族內部也因個人興趣、家風的轉變，使整體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式微的趨勢，也不同程度地導致家族的沒落。以下，分別從不同的面向，討論南宋四明家族內外所面臨的挑戰、家道轉變的因素及其與地域社會的關係。

二、政見歧異衍生對立

從前文的說明顯示，南宋四明地區家族得以崛起，並形成地方社

會的集體繁興，與意見領袖及各家族之間的通力合作，有密切關係。其中史浩更是重要角色。史浩是孝宗的老師，二次任相，在孝宗朝雖因和戰問題，與其他朝臣及孝宗意見不同而不能久任，但他能薦賢、能用人、能任事。除推薦四明同鄉人之外，也廣薦賢能之人，如他於淳熙五年(1178)三月再相後，即急於薦用朱熹、呂祖謙、張栻等人。他有理念又有執行力，雖罷官歸鄉，其意見受到朝野的尊重，有一言九鼎之勢。他熱心參與鄉里事務，而其同鄉好友汪大猷、樓鑰、沈煥、袁燮等人，也都能和衷共濟、協力辦事。從鄉曲義莊的動議到執行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在四明領袖人物推動下，家族之間合作無間的氣象，這是四明地區文化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人際複雜的社會中，要成就眾人的事業，除了有可推動合作的議題與人才之外，能化解疑慮，減少彼此的摩擦也很重要。孝宗淳熙年間，執政的王淮，與道學家的關係相當緊張，幸賴王淮的女婿姚穎從中調和，才能化解成見。袁燮記其事說：「時士大夫各從其類，有黨同伐異之風，君深病之，調和其間，不立畛域。既與葉公定交，又併葉公之友為魯公(王淮)言之，所以消融植黨之私，恢張吾道之公也。」姚穎是四明人，他的祖母則是史浩的姑姑，這樣的身份有助於消弭王淮與史浩間的歧見，延遲黨爭發生。袁燮認為姚穎若長壽，則「天下異同之論，將泯然不見其迹，豈復有後來若是之紛紛哉！」¹²但隨著史浩、姚穎這樣正面領導或在背後化解疑慮的人物逝世之後，當不同政治風浪來襲時，四明地區領袖人物由於政見的歧異，極易由親轉疏，甚而轉為對立，遂使個人乃至家族之間的鄉黨情誼面臨挑戰。

第一個浪潮，來自韓侂胄推動的慶元黨禁。在慶元黨禁的風暴中，

¹² 袁燮，《絜齋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叢書集成新編)，卷15，〈通判平江府校書姚君行狀〉，頁252。

四明人分別居於不同立場，形成對立之勢，有被列為黨人而遭打擊的袁燮、袁韶、樓鑰等人，也有為韓侂胄打擊黨人張目的高文虎、高似孫父子。高氏族人一向在政治立場上與當政者關係較近，如高閌曾被趙鼎提拔，也被評附秦檜。高閌得罪秦檜，罷官回鄉後，仍有仕進之心，曾致書秦檜述其窮困之狀，意圖「覬復恥名，庶幾祿及後人」，以致被朱熹評為「一向苟合取媚」。到高文虎、高似孫父子，攀附權貴的心態更為明顯，他們迎合韓侂胄，是推動慶元黨禁的要角。文虎於慶元四年(1198)奉命草詔禁偽學，與胡紘合黨，攻擊道學，貶逐正人，「學校諸生語言小異，輒坐偽罪」。¹³高似孫則於慶元元年(1195)六月著〈道學之圖〉，羅織道學之人，亦曾獻九錫詩為韓侂胄祝壽，被評為諂佞者，因而不見容於道學家。明人何喬新即批評文虎，說他「不過欲阿時幸，以速富貴耳，豈復顧名義，而知人間有羞恥事哉」。¹⁴雖然韓侂胄對慶元黨禁執行不嚴，但高氏父子與四明道學人士，一同捲入這場政治衝突之中，彼此針鋒相對，使高氏與四明士族的人際關係日益疏遠，¹⁵也降低了四明家族之間協同合作的空間。

與此同時，樓鑰和葉適門人王大受的衝突，也將四明樓昉和史彌遠捲入爭端之中。樓鑰和樓昉是四明兩個不同房系的宗親，樓鑰曾舉樓昉自代，顯示二人或二家關係的密切，但後來樓鑰兄長樓鏞和王大受發生衝突，樓昉似乎支持王大受，使彼此的關係有微妙的變化。而在樓、王互相攻擊的背後，也牽扯到前後二任宰相韓侂胄和史彌遠。

¹³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頁180。

¹⁴ 何喬新，《椒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削前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於道州〉，頁30下。

¹⁵ 石田肇，〈南宋明州の高氏一族について——高閌、高文虎、高似孫のこと〉，收入宋代史研究會編，《宋代の社會と宗教》（東京：汲古書院，1986），頁246-250。

樓鑰先前曾期望史彌遠「竄大受」，但王大受與韓侂胄的女婿顧燾相善而不能如願，以致樓氏兄弟憤恨難平，最後是在韓侂胄為爭取樓鑰的歸心，以逐大受，返樓鑰所削之秩，才結束一場爭紛。事情雖小，但多少也牽涉到四明幾個士族之間的關係，影響彼此的和諧。

隨著韓侂胄被殺，史彌遠繼相之後，不僅南宋政局趨向平穩，對四明士族而言，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史彌遠執政初期，積極招攬人才，重振士氣，《吹劍四錄》即說「學黨五十九人，無非端人正士，盡入劉珪一網。侂胄既誅，史衛王當國，一切擢用，悉至顯官，無一人遺者。天地閉塞之氣，在此一舒，四方憤鬱之情，至此一快。其於國脈，豈小補哉」。¹⁶四明士人也在彌遠的牽引下大量進入朝中，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勢力。當時相府宴客，唱雜劇的藝人將「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詩，改作「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¹⁷就相當清楚地凸顯嘉定初期四明人在政壇上獨居優勢的現象。

嘉定十年之後，不論南宋的外在局勢，或四明士族之間的關係，都有極大的轉變。蒙古迅速崛起，並發動南侵，不僅敲起金亡的喪鐘，也讓宋廷陷於紛擾之中。宋與金、蒙之間形成鼎峙之狀，如何聯盟、抗拒，成為南宋朝廷必須面對的新情勢，對金的和戰也成為朝臣關注爭議的焦點。史彌遠殺主戰的韓侂胄而秉政，主和持重，成為他執政的主軸，但主和之說却招來主張恢復的清議分子的批評，其中理學家如真德秀、魏了翁，以及袁燮，都屬慷慨激昂之輩，相繼對當時執行的對金政策提出批判。¹⁸嘉定十年起，宋金戰火再啟，兩淮、荆襄，

¹⁶ 俞文豹，《吹劍四錄》，收入《宋人札記八種》（臺北：世界書局，1963），頁97。

¹⁷ 張端義，《貴耳集》（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卷下，頁77。

¹⁸ 黃寬重，《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78）。

乃至四川都先後遭到金兵攻擊。雙方的戰爭雖互有勝負，但倡議主和的工部尚書胡榘則批評這些軍事行動的背後是「內因廷臣橫議，外而邊臣邀功」，致使「邊境久未安」。¹⁹這樣的言論引起袁燮的反擊，也爆發四明家族因政見不同而對立的現象。袁燮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今日邊陲不靖，非朝廷有意用兵，緣被其擾，不得不應」。²⁰兩人針鋒相對。袁燮在侍講時，對於四川的緊張情勢，向寧宗提備邊的建言，並指斥和議之非，此舉引起史彌遠的不悅。其後，太學生、宗學生及武學生三百餘人相繼伏闕上疏，斥主和誤國，要求殺胡榘以謝罪。袁燮自恃一代老儒，好持論，不滿胡榘所言，當廷欲以笏擊榘，為眾所奪。臺諫劾袁燮與胡榘各執偏見，求勝報怨，二人均被罷。太學生三百餘人不滿宋廷的處理方式，設宴於都門外，向袁燮賦詩餞別，更引起史彌遠不快，²¹此即袁氏與史家關係轉變的開始。

繼袁燮之後，攻擊當政史家最力的，就是他的兒子袁甫。袁甫自嘉定七年(1214)以進士第一入仕，即成為四明地區受矚目的名人。他承襲其父衣鉢，發揚陸學，個性耿直，在朝則秉持所見，評議朝政。端平二年(1235)，袁甫任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兼中書舍人，他在奏論中，對蒙古兵犯四川，百姓受兵禍之苦，有很深刻的批評。他指出四川的處境，正是「和戰不決，舉措不審，而至召釁納侮」，將肇禍責任歸咎於史彌遠，認為「故相當國，以言為諱，詞臣揣摩意見，多所避忌」，使人民感受不到朝廷德意。因此，建議在推動端平更化政

¹⁹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82，頁 6 下；《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40，〈寧宗本紀·四〉，頁 773；黃寬重，〈賈涉事功述評——以南宋中期淮東防務為中心〉，《漢學研究》，20：2(臺北，2002.12)，頁 174。

²⁰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82，頁 1 下。

²¹ 《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職官〉七三之五二；俞文豹，《吹劍四錄》，頁 109。

策時，更應該徹底矯正史彌遠的作風，「庶幾遠民知上心，亦使軍士生其氣勢」。²²袁甫也對理宗為感念史彌遠擁立之恩，在史彌遠死後，對史家多所迴護，如要求中外臣僚的奏章「不得攢摭，務存大體，以副朕終始元臣之意」的作法，提出嚴厲的批評。他認為史彌遠在理宗一朝秉政十年，使「太祖、太宗之綱理天下者，幾至大壞而不可收拾」，「今保全元勳、禁絕人言之札一頒，天下必又潛疑竊議曰：『是將更端平元年以來之化矣。』」因而要求理宗，「欲全史氏一門，則當使之常有忌憚公議之心，如一撤其閑，將以愛之，適所以禍之也。況宅之兄弟，久處富貴，涉歷未深，正當左右詩書，遵蹈繩檢，不致貽譏清議，乃可植立門戶。故御札未必福史氏，而公議乃可全史氏也」。²³

此時秉政的丞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下令「人戶有田一畝者，輸會一貫，分為六限，三月而足」。袁甫反對鄭清之的作法，他指出州縣不體朝廷之意，使中下戶先受督促之苦，而豪家巨族與胥吏相為表裡，不按時繳納，造成極大的流弊。他也將造成這一景象的責任，歸於「故相當軸，士大夫不義而取之者多矣」所致。為扭轉時弊，他建議「乞睿斷行下諸監司，專主先督勢家之說，過期不納者必罰無赦。如州縣奉行不虔，縱胥吏與勢家為地，抵拒拖延慢上之令，則監司定將守令按劾。如監司曲為庇護，則不即發覺，許臺諫糾察以聞」。²⁴

袁甫對史嵩之的攻擊，更甚於史彌遠。先是，端平元年趙葵兄弟興兵入洛，謀收復三京時，史彌遠的姪兒擔任江西安撫使的史嵩之，力主與蒙古議和，袁甫曾極力反對，²⁵更不書嵩之刑部尚書之誥命，

²² 袁甫，《蒙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乞降招撫論西蜀劉子〉，頁12上。

²³ 袁甫，《蒙齋集》，卷5，〈論史宅之奏〉，頁11上-14上。

²⁴ 袁甫，《蒙齋集》，卷6，〈再論履畝劉子〉，頁4上。

²⁵ 《宋史》，卷405，〈袁甫傳〉，頁12241。

因而出知江州，改知婺州。嘉熙元年(1237)，袁甫遷中書舍人，指議和誤事，並反對史嵩之出任京湖沿江制置使，說他「輕脫難信」。²⁶可以說，袁甫到死前都反對史嵩之或是史家的當權派。理宗雖未全接納他的意見，卻尊重他的想法，全祖望即說：「廣微(袁甫)最荷理宗之眷，而所值時相皆鄉人，前後無一語阿私者。其於史彌遠，言其老當還政；於鄭清之，言其履畝害民；於史嵩之，言其不可為相。嘗因邊遽，條指時務，無不切當。李宗勉薦其可以大用，理宗方欲相之，會以病終。」²⁷袁甫向理宗說：「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²⁸這句話說出了史家內部與史、袁兩家之間的矛盾，貼切的反映理宗以來四明家族關係的疏遠了。

牽動更大的，則是鄭清之、趙葵兄弟與史嵩之三家由友好而交惡，不僅影響四明士族之間的關係，更是理宗朝政極大紛擾的開始。鄭清之與史彌遠同為四明人，因史彌遠的拔擢，以理宗老師的身份，在仕途一路扶搖直上。端平元年(1234)，理宗親政，鄭清之繼史彌遠為相。為了解史彌遠執政時朝野的緊張關係，扭轉理宗的形象，鄭清之一方面揭示「端平更化」的旗幟，招納真德秀、魏了翁等理學名家，推動政治改革，一方面則在其弟子趙葵、趙范兄弟的鼓動下，欲趁蒙古軍北退，執行恢復汴京、歸德、洛陽三京的軍事行動。此舉與一向主張蒙古和議，而且剛聯蒙滅金的史嵩之想法完全相反，也與朝臣期待相違，不僅引起激烈的攻擊，也改變三姓四人的關係。史家與湖南橫山趙方早年關係素融洽，史嵩之的父親史彌忠任咸寧縣尉時，與任蒲圻尉的趙方友好，兩家先後生嵩之和趙葵，乃持羊酒相賀。趙方任

²⁶ 《宋史》，卷 405，頁 12241；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頁 81。

²⁷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 24，〈寧波府儒學進士題名碑〉，頁 306。

²⁸ 《宋史》，卷 405，〈袁甫傳〉，頁 12240-12241。

青陽知縣時，其直屬長官爲史彌遠，二人曾對論爲治之道。由於這樣的關係，使趙方在史彌遠當權後，得以一展長才。²⁹其後，史嵩之與趙葵先後在襄漢立功，均爲理宗早期負有盛名的邊將。不過，二趙與史嵩之對北方政策歧異，如在對付金朝與蒙古兩股勢力的意見上，二趙兄弟傾向與金聯合，史嵩之則主張與蒙古接觸。二趙反對史嵩之聯蒙滅金，並想利用蒙軍北退，中原空虛的機會，收復三京，據守關河以抗蒙古，而嵩之對端平入洛之舉不僅反對，更觀望不助，遂致入洛之師敗退而回，從此三家交惡，也牽動了理宗親政以後，一連串的政治鬥爭。³⁰

當然，在史氏當權時，四明士人固然有因政見不同而與之疏遠，甚至對立的情況，但也有部分鄉人仍依附權勢尚盛的史家。這種現象在史彌遠死後仍然存在。顯然與鄭清之迴護史彌遠的後人有關，史宅之主持的「田事所」即是一例。理宗爲感念史彌遠擁立之功，親政後除了不准朝臣批評史宅之等故相家屬外，也積極地爲史氏後人創造維繫名望的政績，好讓朝臣折服。當時殿步司所轄有蘆蕩地，臣僚認爲可以闢爲良田，增加國庫收入。史宅之時爲都司，遂創括田之議。宰相鄭清之當國，也想增加收入，遂成立「田事所」，將天下沙田、圍田、圩田、沒官田等，撥隸該所，由宅之任提領官，分派官員到江浙諸地打量圍田。四明人汪之桢任檢官，趙與膺爲參議官，各郡也都差朝臣任其責。然而，由於實施時刻剝太過，以致怨嗟滿道，刑罰慘酷，

²⁹ 方震華，〈軍務與儒業的矛盾——橫山趙氏與晚宋統兵文官家族〉，《新史學》，17：2（臺北，2006.6），頁5。

³⁰ 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別集下，〈史嵩之始末〉，頁288-289；袁楠纂，〈延祐四明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元方志叢刊），卷5，〈人物考中·先賢史嵩之〉，頁1212；方震華，〈軍務與儒業的矛盾——橫山趙氏與晚宋統兵文官家族〉，頁10-22。

死於非命者甚多，執行甫一年，有擾無補，高衡孫就對史宅之盡括浙西公田的作法，深表不滿。³¹朝廷也知不可行，但不敢遽停，批評者相繼被罷罪，一直到宅之逝世，才併歸安邊所。³²

四明士人之間的不和，自然影響人際互動與社會和諧。早期的明顯事蹟，像樓鑰與王大受的爭紛，就牽扯了當朝幾個重要人物。史嵩之的內弟陳埴任處州教授時，與知處州高似孫不合，後來也因批評史彌遠的政策而辭官，並為袁燮議諡。³³另一個例子，就是晚宋余晦與王惟忠二位四明人，同樣由於私人恩怨而反目。余晦以王惟忠棄戰逃遁為名，命其黨人陳大方、丁大全攻惟忠，興大獄。最後，以惟忠任知閩州判西安撫府時，喪師底叛、遣援遲緩等罪被處斬。³⁴顯示到了晚宋，所謂鄉里情誼，早已在政治紛擾與個人人事鬥爭中消磨殆盡。

早期四明社會的凝聚力，也表現在鄉里士族組成的社群活動上。四明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是當地家族無私的合作之外，也能接納外來的寓居者，營造共容發展的局面。樓鑰在〈祭趙侍郎〉所說「四明尚齒，猶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寓公」的話，³⁵正說明和諧是四明社會發展的主因。一旦這種族際凝聚力消退，甚至轉為對抗時，許多對立的情勢就會發生，最明顯的表現在詩社上。全祖望對宋元四明詩社的變化，有很詳細的描述。他認為北宋元祐、紹聖間，是四明詩社興起之時，建炎以來則有五老會，以孝友倡鄉里敦厚之俗，而唱酬亦日出。及乾道、淳熙間，史浩、魏杞相繼告老歸鄉，不論鄉居或寓居士人均與盛會，篇什極盛。人際關係甚為和諧，鄉里凝聚力強，因之

31 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4，〈人物考上·先賢高閭〉，頁44上。

32 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下，〈史宅之〉，頁292-293。

33 《宋史》，卷423，〈陳埴傳〉，頁12639-12640。

34 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下，〈王惟忠〉，頁297-298。

35 樓鑰，《攻媿集》，卷83，〈祭趙侍郎〉，頁7下。

能共同經營、組織地方公益活動。但慶元、嘉定以來，一方面有道學家在史家碧沚館的詩社，及另樹一格的樓鑰詩壇，高似孫、史友林別有詩壇，另外史宅之兄弟與趙汝樸等人，在湖上又爲一社。從全祖望的描述與五老會、八老會，乃至真率之集的詩社相較，顯示嘉定以後詩的內容趨於多元，詩社也多了，其中固然有學術品味與文風多元發展的現象，但詩社分立與人事關係的複雜化、人際關係的淡薄化相結，則可看出四明家族之間的競合，影響了家族的發展與地域社會的諧和。雖然咸淳年間被賈似道廢罷的六十多位四明士人，在高衡孫等人組織下，凝聚成一個每月一集的詩社，這是在當權者的壓力下形成的，且只能消極地以詠詩排遣時光，無法也無力再發揮集體的影響力了。況且，這已是趙宋政權步上敗亡的最後階段，隨之而來，則是另一場浩劫了。

雖然，自慶元以來，四明士人在一波波的政治活動中，相繼被捲入，而影響彼此關係與地區的和諧。不過，這段時期不和諧的現象，尙屬個人或個別家族之間的關係，而且仍不斷有人攀登高位，影響的層面尙小。況且，史彌遠執政的嘉定初期，積極招攬黨人，使四明人在朝廷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固然是唱戲者表面上恭維的話，其實也有諷刺的意味，這對史家而言，自然是一種警訊。史彌遠就由于這句話，在此後二十年，宴客時不再用雜劇，³⁶史彌遠此舉，可能也是有感於南宋以來，如饒州人士短暫形成地域性優勢政治集團，而招來「得饒人處且饒人」的譏評有關，而有所顧忌，³⁷也可能鑒於紹熙三年(1192)時，他的兄弟史彌正奉祠家居時，以望族高官的身份，干預地方事務，與知州高夔有瓜田李下之嫌，

³⁶ 張端義，《貴耳集》，卷下，頁77。

³⁷ 陸游，《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11，頁5。

而被罷職的敏感性有關，因此謹慎地處理各項人事。³⁸此後的政治發展，四明士族之間雖因政見不同，形成對立，但在外人眼中，自嘉定以來史彌遠長期任相，專擅朝政，用人有地域考量，益使四明等地形成優勢政治集團，構成其他地區政治群體發展的障礙。如從劉克莊在給事中丁柏桂的神道碑中就記到：「寶(慶)紹(定)間，一相擅國，所拔之士，非鄞即婺。其言曰：『閩人難保，尤惡莆士。』如陳宓、鄭寅之流，皆掃影滅迹，於是朝無莆人。」³⁹這句話固然顯示四明士族的優越地位，但同時也預示四明士族在表象優勢之中，已潛藏的危機。

到理宗淳祐年間，鄭清之再相，他年歲已高，政事多由其侄孫贊可否。當時賈似道任京湖制置使，統軍對抗蒙古軍，為壯大聲勢，「數張軍旅」，向朝廷要脅費用。鄭清之不支持。賈似道忌恨鄭清之及其侄孫，同時遷怒四明人，因此在任相後，即提出浙東唯溫、處人士可任事，四明士不宜用的說法，並以強力手段迫使當時在朝任官的四明人，像高衡孫、趙汝楫以戶部侍郎，汪之埜以知汀州，陸合以軍器少監，章士元以太常少卿，趙孟傳以知贛州，從執政官至州縣官等，凡六十餘人，皆遭罷黜家居。⁴⁰這些鄉居的四明士人，為避免惹禍上身，雖每月定期聚會，但只討論先哲言行，不敢議論敏感的時事，才稍却除當政者的疑慮，但從此四明人在朝者少，家族與地區性的優勢明顯消退。全祖望評論此後四明人殉難者少的原因，是「宋之將亡，四明以賈氏摧折之餘，鮮豫於軍師國邑之寄，故殉難者寥寥」。⁴¹這句話

38 史彌正與高夔，見樓鑰，《攻媿集》，卷 34，〈直敷文閣史彌正為高夔奏厲雄公事落職罷宮觀〉，頁 20。

39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41，〈丁給事〉，頁 1 上。

40 袁桷，《清容居士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33，〈先大夫行述〉，頁 8 上。

41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 23，〈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銘〉，頁 289。

有兩層涵意，一是賈似道對四明士族打擊的力道很強，是晚宋四明政治勢力與家族沒落的重要因素，一是四明士人位居要津，並以其位抗蒙殉節者不多，相對地，蒙元政權建立後，也沒有刻意打擊四明士族。

三、家族與宗族內部失和

四明同鄉士人互相援引、提攜的合作關係，在南宋後期日益激烈的政爭中不復得見，反之家族之間乃至家族之內部出現歧異的聲音，本節將首先觀察家族內部的情形及其對家族發展的影響。

枝開葉茂象徵家族的興隆，但在開枝的同時，也具有家族成員意見不一、利益衝突，甚或引發內部不和，使內聚力消退的隱憂。當然，造成家族內部不和，可以是政治或經濟的因素，但不論原因為何，其結果都可能使家族不能共謀發展，反而因房支分立，造成資源內耗的不良後果。這種家族內部不和的現象，包含同一世代各房支之間，或上下世代之間，以及同宗之間的矛盾等。在四明地區而言，情況最明顯的是史家、高家和屬於同宗的袁氏家族。

在南宋的四明大家族中，史家無疑是最顯赫，但族內的情況也最為複雜。從史浩開始，三代任相，權傾中外，家族成員任官者最多，枝葉繁盛，而且以史浩的名望，與地方上各個士族都維持密切的關係，是四明地區在政壇上最具影響力的望族。不過，自史彌遠任相以後，由於和戰問題，及因擁立理宗，造成湖州兵變、冤殺濟王等一連串事件，不僅引發朝臣攻擊其外交政策與專擅朝政的言論，在史家內部同樣對史彌遠推動爭議性的政策和壓制異議份子的作風，也有批判聲浪。史嵩之任相，再次因對蒙古和議的政策，與朝臣對立，也同樣引起家族成員的批評。這二代都是因為政策方向與權力鬥爭的因素，導致家族內部不和。反對者包括史彌堅、史彌輦、史彌忠、史守之、

史彌應等人。史家的例子顯示，家族關係的存在並不必然意味政治的連結或力量的擴張，相反地，政治立場與主張可能影響家族的團結與發展。

史彌鞏，字南叔，紹熙四年(1193)入太學。在史彌遠秉國時，「寄理不獲試」，淹抑十年始得進士第。任州縣官時，刻濂洛諸賢訓語，以教邑人。他對史彌遠和戰政策與殺濟王案，相當不滿。彌遠死後，鄭清之繼相，招攬被貶名臣如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彌鞏亦在列。他面見理宗，剴切論時政，為濟王案平反，認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本心」，直指史彌遠之非。及其兄彌忠之子嵩之入相，即引嫌乞祠，返鄉後絕口不提時事，自號「獨善」。袁桷稱他「以儒學致顯，當貴盛時，獨卑退自持，鄉人稱為獨善先生」。⁴²真德秀說他「三十年不登宗袞之門，未仕則為其寄理，已仕則為其排擯，矜然不汙有如此」。⁴³

史彌堅，字固叔，為史浩幼子，史彌遠幼弟，娶孝宗同母兄崇憲靖王趙伯圭之女為妻，以軍器監尹臨安。史彌遠為相，他以嫌出為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與批評史彌遠甚力的真德秀關係很好，也曾薦劉宰。彌遠久在相位，朝議不滿，彌堅勸其歸辭，彌遠不聽，「遂食祠祿於家，凡十六年」。⁴⁴他敏於判案，案例曾入《清明集》。死時，吳泳輓詞有「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說明彌堅與彌遠兄弟之間政見不和。⁴⁵

史彌忠，字良叔，是史嵩之的父親。他曾為楊簡所薦，任郡守有

⁴²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8，〈靜清處士史君墓誌銘〉，頁24下-27下。

⁴³ 王厚孫、徐亮纂，《至正四明續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元方志叢刊），卷2，〈人物補遺〉，頁23上。

⁴⁴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28，〈跋宋史史浩傳後〉，頁1055。

⁴⁵ 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5，〈人物考·先賢史彌堅〉，頁22下-23上。

能聲，提舉福建常平鹽茶公事時，薦陳韓平亂有功，名儒真德秀遺書讚美。當時，從弟彌遠久在相位，朝臣多所抨擊，彌忠勸其歸，未果，乞致仕。

史彌應是史浩從子，號自樂翁，嘉定七年(1214)進士。他的個性恬退不求進。陳埴稱其詩說：「余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自樂翁，常罹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傳逸度於將來。」全祖望稱史彌應「亦史氏之君子也」，⁴⁶將他列為與史氏當權派意見不同的人。

從有限的資料，我們看到史彌遠同輩的兄弟中，有四個人對他的執政表示不滿。他們除了提早乞祠，不理時事之外，更與史彌遠的政敵如真德秀交好；子姪輩中，如其姪史守之，因不滿彌遠所為，退居湖上，請楊簡在家塾中講學，「終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陽，著《升聞錄》以寓諷諫，與慈湖先生講肄不倦」。守之受楊簡之教，終身不應召命，乃是直接表示對史彌遠的抗議。守之積極營建故居真隱觀，觀中林泉極盛，全祖望說：「湖上之勝，遂盡歸史氏，蓋史氏自嘉定以後，不為清流所與，而忠宣(史彌堅)、子仁(史守之)則雞群之鶴，克守忠定(史浩)家法，不以宗袞累其生平，慈湖(楊簡)、絜齋(袁燮)諸公過從不絕，而又重以端憲之精舍，故洞天為之增色。」⁴⁷

到了史嵩之當政時期，史氏家人公開反對史嵩之，衝突更為嚴重，如史宅之、史璟卿等人，皆有上書直陳史嵩之之惡，甚至涉及家務醜聞。《癸辛雜識·史嵩之始末》記史宅之上書攻嵩之起復事，說：「嵩之之從弟宅之，衛王(史彌遠)之長子也，與之素不咸，遂入劄，聲其惡，且云：『先臣彌遠晚年有愛妾顧氏，為嵩之強取以去。乞令慶元府押

46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 28，〈跋宋史史浩傳後〉，頁 1055。

47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 18，〈真隱觀洞天古蹟記〉，頁 901。

顧氏還本宅，以禮遣嫁，仍乞置嵩之於晉朱挺之典。』」⁴⁸史嵩之最後在內外反對聲浪中，起復不成，只好乞退。史嵩之的致仕，不僅象徵著史家三代在南宋秉政的結束，同時家族內部由失和走向沒落，也肇始於史彌遠、史嵩之執政表面上最顯赫的時期。

前述史氏由家族內部的不和以致對立，也同樣影響到家族外部的關係。史浩曾延請楊簡教其子弟，包括史彌遠、史彌堅、史彌忠、史彌鞏，史彌林、史守之、史定之等七人。⁴⁹史彌遠就是楊簡的學生，但楊簡並不認同史彌遠的作法，他曾向理宗直言：「臣平日所以教彌遠者不如此，彌遠之置其君如奕棋。」⁵⁰可見師徒關係之緊張。史璟卿上書陳述其叔父史嵩之之惡，更使另一位世家子弟應文煒受到史嵩之的牽怒。應文煒與史璟卿、袁桷的父親袁洪相友好，史嵩之認為璟卿的上書與文煒的教唆有關，命下屬掠治，此舉無疑亦加深史家當政的一系與當地士族的衝突。⁵¹

除了史家之外，高氏家族內部的不和也是一個顯例。高氏家族自高閌任國子司業禮部侍郎起，即成為四明士族。高文虎、高似孫父子二代，在寧宗一朝官位更高於高閌，是家族發展的盛世。然而，高文虎、似孫父子不僅為人處事迭遭批評、仕途多變外，父子關係亦不和。史稱似孫對其父不孝，父子爭財，並曾刪改文虎所做〈蘭亭博議敘〉二篇，及改文虎之序等事。雖洪業為文為之辯護，但家族內部不和則

48 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下，〈史嵩之始末〉，頁 288-289。

49 黃宗義，《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 74，〈慈湖學案〉，頁 2459-2465；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 16，〈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頁 871。

50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 16，〈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頁 871。

51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33，〈先君子蚤承師友，晚固艱貞，習益之訓，傳於過庭，述師友淵源錄〉，頁 16 上-下。

爲事實。⁵²嘉定以後，衍孫、衡孫雖仍任官，但衍孫一房移居嘉定，枝葉離散，顯示至此四明高氏家族已難再現整體的發展了。

另一個同姓不和的例子，則是四明三個同宗的袁氏。鄞縣袁氏有三支，一是鑒橋袁氏，又稱城南袁氏；一是西門袁氏，又稱城西袁氏；南袁氏，則又稱南湖袁氏。鑒橋袁氏的代表人物，即是陸學的重要傳人袁燮、袁甫父子。自袁燮發跡以來，袁氏從教育著手，打開科舉之路，追求仕途發展，並藉婚姻穩固人際網絡，袁燮父子二代既任高官，又致力於學術，以發揚陸學爲職志，在鄉里聲望甚著，是南宋晚期三袁氏中最顯赫的家族。⁵³南袁氏居鄞的確切時間不清楚，但袁穀與袁穀同試進士，則已落籍四明，後遷祥符，靖康之亂後再遷回四明。西門袁氏在唐代，即有任宰相、執政、侍從的顯官。宋高宗南渡時，袁子誠自南昌扈駕遷居四明，最晚落籍於鄞縣。

南宋四明三袁氏中，鑒橋袁氏與南袁氏的關係較爲密切。興復南袁氏的袁韶，三歲便從袁燮學，他曾摹寫袁燮夫人戴氏所摹顏真卿的碑體，兩人在韓侂胄推動慶元黨禁時，均被貶抑，患難見真情，這是兩家關係最密切的時候。⁵⁴元代南袁氏的代表人物袁桷在〈先大夫行述〉一文中，述說袁燮和袁韶的關係：「祖諱韶，幼學于族父正獻公燮，登淳熙丁未(1187)第。嘉泰禁道學，自趙忠定(汝愚)以下皆入黨，正獻公坐廢。越公爲吳江丞，得罪蘇師旦，俱家居避禍。嘉定改元，褒敘趙忠定公、朱文公，於是相次被召，先後爲侍從，縉紳榮之。」⁵⁵袁韶更透過合譜的方式，來加強二個袁氏家族的關係。袁桷即說：「衛

⁵²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頁182。

⁵³ 洪業，〈高似孫史略箋正序之一〉，《史學年報》，1：5(北京，1933.8)，頁6-7。

⁵⁴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頁1上。

⁵⁵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0，〈先大夫行述〉，頁5下-6上。

公之子越公(袁韶)，從正獻(袁燮)游，考兩家南北之分，使得合譜。……正肅公見越公鄉薦，時年始九齡，自是敦敘不絕。」⁵⁶這是兩家關係最密切的時候。

不過，到嘉定以後，兩家敦敘情誼逐漸轉疏。史彌遠當權之初，招攬群賢，四明名士盡在其中，袁韶因與史家連姻(袁桷的叔父娶史浩的孫女)之故，⁵⁷關係密切。及史彌遠對金蒙和戰政策得罪清議，濟王案起，又盡貶清議朝臣，這些舉動都使清議領袖袁燮不值其作為，起而攻之。但袁韶則轉而投靠彌遠，得任高官，被譏為「史氏之私人」，⁵⁸兩個袁氏家族的關係轉為疏淡。

然而到理宗紹定年間，袁韶與史彌遠關係又有轉變。周密對二人關係的改變，有清楚的說明，他說：「袁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彌遠)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既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繇文昌，躋宥府、寢寢乎炳用矣。適誕辰，客又獻詩為壽，此詩既傳，史聞惡之，旋即斥去。」⁵⁹顯示袁韶受理宗賞識，而得罪史彌遠之事實。袁桷對袁韶與史彌遠、袁燮關係的變化曾有解釋，見於他給袁燮後人袁瑛的詩中。⁶⁰但全祖望認為袁桷對此事仍多所隱諱，說：

袁越公韶為執政，世皆指為史氏(彌遠)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己而去。蓋嘗考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於越公曾

⁵⁶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50，〈跋正肅公手澤〉，頁 1 下-2 上。

⁵⁷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33，〈西山阡表〉，頁 1 下。

⁵⁸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 24，〈二袁先生文鈔〉，頁 981。

⁵⁹ 周密，《癸辛雜識》前集，〈袁彥純客詩〉，頁 42。

⁶⁰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3，〈再從姪瑛幼孤學道龍虎山，自傷不能鞠攜，述祖德以勉之〉，頁 1 下。

孫清容之手，……越公少為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無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史、袁卒為婚姻，故亦共諱其事，清容亦欲為祖諱，故言之不盡。⁶¹此後，鑒橋袁氏沒落，南袁氏轉盛，兩家雖仍時相往來，已不像嘉定前熱絡。

另一方面，南袁氏與西門袁氏則因對蒙元政權的認同問題而交惡。西門袁氏在南宋的名望不如其他二袁，但宋元之際，袁鏞倡議抗蒙不成，最後為國死難；反之，南袁氏的袁洪則是四明主降及與蒙軍談判的要角，一抗元，一降元，這是兩個家族入元以後家道興衰的關鍵所在。全祖望認為二家交惡之因是袁桷向西門袁氏求通譜不遂，懷恨在心，及為掩飾其父袁洪降元事蹟，遂在《延祐四明志》中，遺漏袁鏞死難事蹟，反而為降人趙孟傳、謝昌元及他的父親袁洪立傳。全祖望批評袁桷「清容文章大家，而《志》頗有是非失實之憾。如謝昌元、趙孟傳皆立佳傳，而袁鏞之忠反見遺，蓋清容之父亦降臣也。」⁶²

元人戴良在〈四明袁氏圖譜序〉中所說：「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後哉？然歷世浸遠，支派日分，盛衰、隱顯之迹，有不齊矣。死生患難，慶弔收恤之禮，不能以相及矣，同氣相視如途人矣。」⁶³這番話，雖然是針對氏族長遠發展下，支派分立而疏遠所作的說明，其實從三個同宗的袁氏的關係變化看來，宗誼族情會因為政治立場的歧異，而由親轉疏，或由淡而交惡，甚至整個地域社會的和諧互動，均敵不過現實環境的考驗，彼此關係相當脆弱，從史氏、高氏，乃至袁

61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 28，〈跋宋史袁詔列傳〉，頁 1059。

62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 35，〈延祐四明志跋〉，頁 1169。

63 戴良，《九靈山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1，〈四明袁氏譜圖序〉，頁 4 下。

氏宗族內部關係的變化，可以得到證明。這種關係雖是個別發生或逐漸變動的，但家族的凝聚力就在逐漸變動中鬆弛、分解，一旦有外力衝擊則迅速崩解。

四、家族與社會風氣的轉變

如果四明士族之間，到南宋中晚期，因政見歧異，引發對立，影響家族及地區的整體發展，是一種外在的衝擊，那麼子弟興趣的轉變以及家族與社會風氣的轉移，則是影響家族興衰的內在因素。如前所述，科舉考試不僅讓朝廷藉以拔擢有能力的士人參與朝政，以改變世家大族壟斷社會政治資源的現象，更是個人、乃至家族的興替重要指標。在科舉社會，有中舉經驗的家族，在競爭上具有優勢。他們具有經濟條件，可以購買圖書，延師教子弟，也有考試的經驗。同時，透過婚姻、師友關係，所開展的人際網絡，有利開拓新的事業。高位者，更具蔭補條件，可以讓子弟免受科考的煎熬，即能擁有官位，保有仕宦之家的榮銜與名聲，這些都是名門望族的有利條件。不過，科舉畢竟是開放的，具有競爭優勢的家族，仍需有諸多條件相配合，如子弟足夠資質，聰明又肯學，而且志在舉業，願意延續長輩的心願，更重要的是才質與運氣相結，才能確保優勢。⁶⁴一旦內在的意願與能力，和外在的因素不能搭配，則仍然難以維持家族的榮景。況且，即便具蔭補條件者，除少數特殊者外，通常不能任高官。如賈似道的父親賈涉，以蔭補入仕，仍能擔任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⁶⁵程鄰以父蔭官至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趙葵、趙范兄弟也因父蔭而任高

⁶⁴ 梁庚堯，〈宋代福州士人的舉業〉，《東吳歷史學報》，11（臺北，2004.6），頁 175-213。

⁶⁵ 《宋史》，卷 40，〈寧宗本紀·四〉，頁 777。

官，但這些人多因戰功或守邊而任官。在承平時期的例子並不多見。⁶⁶因此，舉業是家族累代都不能鬆懈，需要高昂的鬥志和耐力，長期全力以赴，才能持續維繫家道。

不過，富盛之家有更多樣的生活空間吸引子弟的注意。名門望族的子弟在舉業上雖具優勢，但身處富貴之家，也擁有教育以外許多豐厚的資源，吸引他們，如任官的父兄，為顯示身分或休閒養性或為結交名流，培養許多如購書玩物，乃至吟詩唱戲等文藝活動的興趣與嗜好。這些休閒嗜好，既可調節身心，也是交際的手段。更有甚者，則在功成名就之後營建庭園，藉以提升生活品味或誇示榮耀。這些做法，顯示官僚有寬廣多樣的生活空間，置身其中的子弟，也會被這些豐富多樣的生活事物所吸引，況且高官子弟又可蔭補任官，維持社會聲望，未必願意長期從事孤寂又無把握的舉業。這種個人興趣乃至家風的傳承與轉變，同樣也影響家族的發展。

從四明幾個著名士族興衰隆替的過程中，都可以看到家族成員有意或無意地將心力關注在科舉之外的其他方面。這種因興趣的轉變，乃至家風的轉移，經過一、二代，就會導致家道的沒落；有的經歷子弟的回歸舉業，可以再振家聲，有的則一去不回了。這種變化，依每個家族的情況，而有遲速之不同，並非一成不變。鑒橋袁氏在袁堦、袁文二代，家道中衰。袁堦喜詩文，不熱衷功名，不治產業，篤信佛教，樂善好施，出手大方。他的母親石氏一臂劇痛，他發願修補隨州城內所有佛像和寺廟，所費不貲，遂使經濟狀況每況愈下。其子袁文，幼時深受父親期待，努力舉業，卻不能如願，轉而致力經學研究，「一書精通，始閱他書，歷代史、諸子若集及叢編、小說，咸采取焉」，

⁶⁶ 見黃寬重，〈賈涉事功述評——以南宋中期淮東防務為中心〉，頁 165-188；

〈宋代浮梁程氏家族的興替〉，收入《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5-212。

著有《名賢碎事錄》三十卷、《甕牖閒評》八卷，後者涉及小學、經、史、天文、地理、宋朝時事及詩、詞、文章，至今仍流傳，是一部具有學術價值的筆記作品。⁶⁷除了讀書，他的主要興趣是鑑賞古物，袁燮說他「頗喜古圖畫器玩，環列左右，前輩諸公遺墨，尤所珍愛，時時展對，想見其人，雅尚清致」。⁶⁸

袁文的從兄弟袁方是另一個例子，他幼時放蕩不學，結婚後受到妻子范氏的鼓勵，始刻志向學，精於詩學，但考試不得志，以教授生徒維生。袁方爲了生計，東奔西忙，「東涉大海，雪浪浩渺；南踰粵嶺，風木淒吼」，非常艱苦，五十歲時已體弱多病。他的同學樓鑰憐憫他貧痛，常送藥慰問。⁶⁹這是袁氏第三、四兩代族人舉業不順後，興趣轉移而至家道中落的情形。

到了第五、六兩代，由於袁文一系出現了袁燮、袁甫父子俱中進士，又任高官，且爲陸學重要傳人，聲名顯著，是鑒橋袁氏家道興復之時，但其他人官位不高，興趣偏於教育及著作。袁甫的兒子袁僊僅知曾任潭州通判，事蹟不明，其孫袁哀曾任安定書院的山長。袁哀雖曾和同宗的袁桷討論到宦族久當圯，宜斬爲傳遠計，但不久袁燮舊宅遭火，家藏盡燬，到晚年則「以憂窘困躓」。⁷⁰袁氏另一後人袁瑛，爲袁哀姪輩，年幼喪父，出爲道士，學於龍虎山。⁷¹顯然，袁氏不待新政權的政治壓迫即已衰落了。

四明樓氏自樓鑰以後，家族成員多以文藝活動爲重，不再專事舉

⁶⁷ 袁文，《甕牖閒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⁶⁸ 袁燮，《絜齋集》，卷16，〈先公行狀（代叔父作）〉，頁266。

⁶⁹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頁75。

⁷⁰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0，〈海鹽州儒學教授袁府君墓表〉，頁20下。

⁷¹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再從姪瑛幼孤學道龍虎山，自傷不能鞠攜，述祖德以勉之〉，頁1上-3上。

業。樓鑰是樓家成為四明重要家族的代表人物，他雖擅長行政，處事圓融，支持理學，但最感興趣的，殆為追隨他的祖父樓昉的足跡，在原址重建奎畫、錦照等堂，並以東樓為藏書之所，「集古今群書於其上，累奇石於其前，嶄然有二十四峰之狀」。⁷²錦照、東樓是樓鑰晚年讀書會友之所，他喜歡蒐集古董，自稱「余每見舊物，無不愛玩」，積極蒐藏其祖父的舊物，包括從榷場買到其祖父所刻的〈嵩嶽圖碑〉。⁷³讀書、怡情、玩賞、交遊，是樓鑰晚年興趣及生活的重心所在。

樓鑰的後人，多由蔭補入仕，並不熱衷仕途，沒有爭取參與中央朝政的想法，而是謹守家規，在鄉里從事文藝活動，維持地方聲望來延續家風。好比樓鑰堂兄樓鏜的三子樓洪，曾刊印樓璣的《耕織圖》行於世，樓鏜的幼子樓深喜歡蒐藏書畫，大約樓璣所藏的文物都歸樓深。⁷⁴樓鑰的兒子樓治，也同樣喜歡收藏文物典籍，曾蒐集樓鑰的詩文，刊刻了一部極為精美，具有嘉定時代文物代表性的《攻媿先生文集》，⁷⁵他並不在意經濟生活，以至死的時候，家無餘金。⁷⁶

宋元之際，更是樓氏衰替的關鍵。樓氏從開慶元年(1259)起，既未見第科記錄，也未見族人相關活動的記載。樓家的義莊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及大德十年(1306)，又二次遭族人盜賣瓜分，乃至為富民侵占，

⁷² 袁燮，《絜齋集》，卷 11，〈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頁 184。

⁷³ 樓鑰，《攻媿集》，卷 75，〈跋黃刺史公移〉，頁 2 下；〈跋先大父嵩嶽圖〉，頁 18 上。

⁷⁴ 樓鑰，《攻媿集》，卷 72，〈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絲書〉，頁 5 上-下；卷 74，〈跋從子深所藏書畫〉，頁 3 上-8 下。

⁷⁵ 《攻媿先生文集》原刊共 120 卷，裝印精美，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張玉範，〈《攻媿集》宋本、文淵閣四庫全本書、武英殿聚珍本之比較〉，《國學研究》，11(北京，2003.6)，頁 351-364。

⁷⁶ 王梓材、馬雲濠，《宋元學案補遺》(四明叢書本)，卷 79，頁 47 上。

導致畫錦義莊幾乎荒廢。⁷⁷樓氏部份族人遷居義烏；留在明州的族人則顯然退出士族的行列，以致為樓氏撰寫〈畫錦樓氏義田莊〉的慶元路總管府推官況達，在訴說義莊訴訟過程時，雖指出經此一勝訴後，族人可以「復食於畫錦，築祠堂以奉先祀」，⁷⁸但這顯然也只是假象而已，其實入元後的樓氏家族已是「族婁且弱」了。⁷⁹

四明高家不像史家一樣累世高官，但能成為名門望族，除了以善於觀望政治風向，向執政者靠攏之外，就是家學傳承甚遠。觀望風向固然讓高氏得以一時取得高位，卻也得罪士人，在政治環境變化之後，往往也成為被批判的對象，而因此與鄉人疏離。高閌續承洛學，致力禮學研究與發揚春秋學的風格，雖一度為他帶來仕途的不遂，卻也讓他與四明士族更為親近。高文虎除延續修史的傳統外，對文學及蒐集各類文物都有興趣。他的著作包括《天官書集註》、《史記註》一三零卷、《續菜經》、《百菊集譜》、《蘭亭考》及《續考》等。⁸⁰高似孫見聞廣博，關注事物頗多，勤於蒐羅文物，著作豐富，包括《騷略》、《蟹略》、《硯箋》、《史略》、《陰符天機經》、《緯略》、《刪定桑世昌蘭亭考》等。似孫的著作以博雜與快速著稱，但多屬彙理抄撮之功，不是專精之作。其鄉人戴表元則認為他的詩可與陸游並列齊觀。袁桷即說：「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衡孫等人為端平正士，修儀偉貌，年八十餘，手抄見聞及方技諸書。」⁸¹衍孫更講究生活情趣，袁桷說：「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君衍孫，興

⁷⁷ 見黃寬重，《宋代家族與社會》，頁112；梁庚堯，〈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頁231。

⁷⁸ 王厚孫、徐亮纂，《至正四明續志》，卷8，〈學校〉，頁19-21；李家豪，〈沒落或再生——論元代四明地區的士人與家族〉，頁48。

⁷⁹ 王厚孫、徐亮纂，《至正四明續志》，卷8，〈學校〉，頁19-21。

⁸⁰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頁181。

⁸¹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1，〈高一清醫書十事序〉，頁23下。

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畫賢士，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敘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往時搢紳類能夸詡之。」著有《五音總韻》、《脈圖》。⁸²顯示從高閔以降，高氏族人的著作反映他們興趣，有由經史向詩文、博物、醫學轉變的傾向，說明高氏家族家境富饒以後，族人追求精神層面的文藝活動，且趨於多元化。

最值得觀察和討論的另一個四明名族，則莫過於三代居相的史家了。史家是南宋四明地區透過科舉追求功名的典型家族，史浩、史彌遠、史嵩之等人的事蹟多在政務上。從史籍上，我們看到的多是他們主持軍國大政和政爭的一面，鮮少看到對他們生活和興趣的一面。不過，在龐大家族中，各房各支的情況不同，我們可以在史彌遠、史嵩之專政期間，從其他史家的人，為避免政敵牽扯，或參與抵制二人的作法中，看到他們避世的一面，及富盛家族族人的興趣和不同生活樣貌。

史浩退休後，是以詩社與推動地方公益慈善活動為生活的重心，史彌遠曾從楊簡習心學，從政之後，作法與道學之士期待相違，甚至引起楊簡的譏評，他亦無暇再理學術。他的同胞兄弟，凡反對他的人均回鄉家居，或延師講學，或分組詩社。⁸³史浩曾孫史文卿，字景賢，也相當講究生活品質。袁桷說他「儀觀清朗，超然綺紈之習，聚四方奇石，築堂曰山澤居，而自號曰石窗山樵。……石窗手執烏絲欄書展玩，疑有所構思……屏後一几，設茶器數十，一童偃背運碾，綠塵滿巾，一童篝火候湯，蹙唇望鼎，若懼主人將索者，如意塵尾，巾壺硯紙，皆纖悉整具，羽衣烏巾，玉色絢起，望之真飛仙人」。⁸⁴史浩的從

⁸²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48，〈書高使君脈圖後〉，頁 12 上-13 下。

⁸³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 25，〈句餘土音序〉，頁 1008-1009。

⁸⁴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7，〈煮茶圖并序〉，頁 1 上-下。

姪史彌應，是史家的特異之士，他雖進士及第，但和積極參政的族人不同，號自樂翁，不喜歡談論時事，而志在追求行吟空山的恬淡生活。他喜歡作詩，陳埴說他「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傳逸度於將來。……以為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世所傳《自樂山吟》者也」。⁸⁵

此外，袁桷的祖父袁韶年輕時，家貧不能買書，任官以後則積極買書，「凡二十有五年，乃務置書，以償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則從中祕書及故家傳錄以歸，於是書始備矣」。⁸⁶至於汪氏家族之為四明名族，除汪思溫、汪大猷父子任官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二代是地方社會文化的主要推動者而享聲名。其家中成員在仕進和其他方面的表現都乏善可陳，茲不贅述。

從文虎、似孫、衍孫，和上述樓鑰父子講究喜好玩物、古董、生活品質，袁韶勤於蒐集圖書，都揭示出嘉定時期四明地區高門大族所追求的，已不是科舉功名、有形的事功或經營產業及利潤，而是崇尚文藝性的風潮。這在嘉定年間，也是江南官宦士族的主要風氣所在。袁桷即說：「于時國家承平，四方無兵革之虞，多用文儒為牧守，公私間暇，擊鮮享醴會寮屬，以校讎刻書為美績，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倣，以取衣食。」⁸⁷這種社會時尚，姑且稱之為「嘉定現象」，而其轉變與當時的政經環境有密切關係，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課題。總之，四明士族到南宋中晚期，有的捲入政治紛擾的對立環境中，有的則不以舉業或仕途為重，淡出政治，轉而注重文物蒐集，發展文藝，講究生活品質的提昇，士族發展目標既已轉變，從家族興衰的角度看來，在蒙元入主江南之前，四明士族已處於家道不振的階段。

⁸⁵ 本句文字引自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 28，〈跋宋史史浩傳後〉，頁 1055。

⁸⁶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22，〈袁氏舊書目序〉，頁 11 上-下。

⁸⁷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22，〈袁氏舊書目序〉，頁 11 上。

從四明士族家風的傳承與轉變中，我們可以看到改變家族最大的因素，是內在的，即是家族成員能力與意願，最為重要。能否從事科舉靠能力和意願，即便中舉入仕，是否願意為高位而奔忙，也取決個人條件。況且，從政也有很高的風險，因此任官者多置產，期能惠及子孫，或致力於文化活動，但這些作法，都影響著子孫的學習方向。因此，即便沒有家族內外的變化，或者雖有種種制度化的安排，對家族的發展而言，也不是決定性因素，只有興衰遲速之別而已。從四明各家族對科舉進取心的差異，以及追求生活趣味的不同程度，決定了家族興衰的遲速。

餘論

以南宋的四明而言，文化高度發展、長期的政治優勢，是一個明顯的表徵，而這都是四明士族共同創造的歷史業績，但到蒙元政權入主江南後，這些名門望族就如土崩瓦解似地消散殆盡，其變化之巨大，讓人直以為政權遞嬗是家族衰替的主要關鍵。但實情如何，須突破朝代的藩籬，進行長時期的觀察才能理解。本文就是試圖以衰替的角度，觀察四明士族從南宋到蒙元期間的消長現象。這樣的觀察就是把四明地區的士族視為一個群體，強調在現實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實際的人際關係，對個人、家族乃至地方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因此特別將家族研究與現實的政治發展結合觀察，相信較之以往只對婚姻社會網絡作抽象性通則性的觀點，更能貼近現實環境，有助於理解歷史發展的樣貌。

關於入元以後，四明家族新、舊交替的情況，李家豪已有研究。他雖認為四明士族中，有的不待蒙元政權入主，就已有衰弱之勢，但仍舉出舊家族沒落、新家族興起的具體事例與原因，說明新政權對舊

家族的破壞。他提出蒙元軍進逼四明時，只有袁鏞抵抗殉國，反之知慶元府的宋宗室趙孟傳和其部屬謝昌元，及士人袁洪、臧夢解等人，則選擇降元。說明當地人對新政權沒有抱持敵對的態度，他們的選擇，既符合四明人的利益，也得到其他四明士人的諒解。因此，四明是在沒有太大的抗拒下就歸順元朝，⁸⁸也避免了一場浩劫。

雖然如此，但四明士人在新政權統治下，仍時時感受威脅。李家豪指出，四明人即使免去了一場屠殺，新政權對四明士人的疑慮仍是存在的。蒙元將領王世強率兵監視四明士人，並以重賞鼓勵告密，於是產生「舊不快意於衣冠者，爭相上變入爵」的情事。曾任宋沿海制置使參議的陳允平，便在仇家誣陷下被疑，而且牽連許多士人。最後，在袁洪向張弘範建議「安反策，定新國，當絕告誅羅織」，才和平收場。陳允平案顯示，士人家族在蒙元政權統治下，不時面臨威脅。這點，可以從四明士人陳著給袁洪的信中，看出士人所承受的衝擊與壓力，他說：「我輩自有所可寒心者，凶狡滔天，名分掃地，關係非小，……甚可畏也。」⁸⁹除了元政權監控外，四明士人還要面對降元將領范文虎的掠奪土地，及胥吏的欺壓，「里胥躡躑士族，著片紙叱名，立召庭下」。⁹⁰顯示在新的政治環境中，以往四明士族獨享尊榮的時代是過去了。⁹¹更從一個側面揭示戰亂與改朝換代對士人家族的衝突。

從元初文獻中，仍能看到許多舊家大族在新政權入主之初、天下未靖時，逃難的艱辛與危險。如戴表元在〈王丞公避地編序〉中，提到他和王子兼面對亂時的處境，說：「越明年，兵聲撼海上，村郊之

88 李家豪，〈沒落或再生——論元代四明地區的士人與家族〉，頁 10-13。

89 陳著，《本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80，〈與袁竹初洪〉，頁 10 上。

90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26，〈資善大夫資國院使贈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順義郡公諡貞惠呂伯里公神道碑銘并序〉，頁 7。

91 李家豪，〈沒落或再生——論元代四明地區的士人與家族〉，頁 16。

民往往持橐束縑而立，伺塵起即遁。余與公勢不得止，倉皇棄其故業，指山中可舍者爲之歸。蓋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百折。」⁹²袁桷也說：「咸淳閱十禩，諸縣獨奉化號多士流，出入太學上南宮亡慮十餘人，于時蜚聲秀穎，旁縣皆斂手避讓，一時傳誦習讀，謂清選不歲月可馴致。未幾，皇元合一，皆失仕歸里，挾策授徒，踈糲自給，俱不能享中壽，子弟不自振飭，復歸爲農。陳君亦咸淳甲戌進士，不自矜褻，接幼待賤，謙挹愈加，混迹蒿翳，不知其爲故官。」⁹³則從另一個側面揭示戰亂與改朝換代對家族興衰的衝擊。

不過，如果細審個案，則四明幾個重要家族，如樓氏、袁氏、高氏、汪氏在宋末就已勢衰，即使是繁盛百年的史家，到宋末雖然枝葉仍茂盛，其實只是個別房支的榮景猶存，整個家族的衰敗之象已露。蒙元進入明州，並沒有特別運用政治手腕對付這些舊時王謝之家。這些舊時富盛家族，受到歧視與折磨和一般士人家庭是一樣的。只是這一折磨無疑是加重了這些家族的淪落，這種現象尤以史家最爲明顯。因此，新政權並非導致四明舊家族沒落的最主要因素。

在我的研究中，顯示即使對個別家族而言，科舉對家族的興衰發展仍極爲重要。中舉入仕是家族興盛的基礎，而追求仕進更屬關鍵；婚姻、地方活動固有利於擴大人際關係，增加發展的資源，但如果自身不具備發展的條件或意願，婚姻與人際關係的助益不大。地方活動的參與，固然有利於聲望的累積與提升、人脈的擴展，但這些地方公務的推動，是要在彼此合作、和諧，大家關注共同的議題、彼此願意付出的情況下，才能成功。如果關心議題不同、作法不一，更重要的，家族之間如果不能合作，則地方事務很難有具體的成果，地方社會也

⁹²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11，〈王丞公避地編序〉，頁1下。

⁹³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8，〈陳縣尉墓誌銘〉，頁24上-下。

很難有整體性的發展。四明地區的公益事業，如鄉曲義莊、鄉飲酒禮等，都是南宋中期當地士人家族在地方領袖倡議下合力促成的，有其特定的時空環境。一旦家族內外都出現緊張或不和的時候，原有的和諧關係難以維繫，守成即屬不易，甚至在家族內都可能發生侵占、盜賣，而要訴諸官府。宋末元初，四明地區許多地方事務和家產爭紛，都和族內或鄉里人際關係的改變有密切關係。一旦家族不和或沒落、社會對立時，婚姻關係所能發揮的效果就相當有限。因此，如果，不深一層考量人際關係的實際情況，只看表面抽象的「策略」原則，未必能符合現實的發展與變化。

科舉是個人爭取功名、從政，乃至家族發展的重要基礎，世家大族在這場競逐中雖具有優勢，但能否通過考試，仍取決於個人的能力和意願，並沒有絕對的把握。同時，世家子弟身處優渥的環境中，除了有利於讀書考試之外，也有許多引人入勝的多元發展空間，如宗教、學術、購買圖書、古董文物，乃至習醫或追求文學及閑逸的生活情趣等，都會影響子弟對舉業的進取心。況且，涉入仕途，仍有許多政治風險，如因政治結盟而釀成黨爭，既非個人所樂見，對家族發展也未必有利。因此，個人興趣的發展或家學，乃至社會風氣的轉變，都會影響個人乃至家族的發展。

從上面幾個角度觀察南宋四明士族的發展，可以發現影響家族興衰的諸多因素中，家族成員參與科舉競爭的能力、意願等內在因素，更為重要，而家族內部和鄉里族際的和諧，則是導致家族乃至地區社會共同發展的重要因素，四明地區的大家族有別於其他地區家族發展的，殆為四明士人家族經由團結，所共同塑造出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和優越的政治影響力。這一優勢，給四明士人帶來全國性的知名度，但其所形成的政治優勢，也讓其他地區的人，感受到極大的發展壓力。因此，當賈似道當政時，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他可以用打算法

整肅趙葵、向士璧、李曾伯等宿將，而刻意培養自己屬意的軍事新秀如呂文德等，更可以壓抑四明人而拉攏溫州、處州士人。在政治力的壓迫下，任官的四明士人只得辭官鄉居，諱言時事以避風頭。這股政治壓力，對原已脆弱衰敝的四明士族而言，其打擊之大，相信較之蒙元政權進入江南更為直接而且嚴重。

此外，四明士人興趣與家風的改變，也影響家族的衰落。當然，個別家族有不同的情況和發展，但嘉定年間，則是家族與社會風氣改變的主要時期。從諸多的資料顯示，嘉定年間，除局部爆發戰事，或討論備戰之外，仍處承平時，江南地區更見昇平景象，文化活動特別興盛，士人家族注意購書、買古董，講究生活品質，甚至連醫療的品質也都注意。這方面，南宋中晚期許多重要文集如樓鑰《攻媿集》、周必大的《文忠集》、袁燮《絜齋集》、袁甫的《蒙齋集》乃至劉克莊、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的文集，都透露了這是一個文化活動頻繁、文化多面向發展、文風興盛的時期。由於社會風氣的轉變，居文化領導的四明士人，開風氣之先，關注舉業以外的事物，各項文藝、文化活動在士族之間開展、流傳，形成風潮。此時，舉業雖屬末流，却仍是影響家族發展的要素，士人不講求此道，對個別家族或地方社會而言，自屬不利。因此，在賈似道當政之前，四明士人多已棄功名而轉就文化生活了，只是四明士人的政治勢力，對賈似道而言，仍是極大的陰影，有如芒刺在背，當然要擊之而後安。

因此，從總體來看四明的士族發展，他們所以能在南宋崛起，源於四明教育的發達和經濟條件的優厚。個別家族崛起之後，所形成的集體力量，則得力於彼此的提攜合作，這方面史浩之功甚大。在他的倡導下，四明地區的士人和士族走出家族，共同關懷鄉里、經營地方，不僅為各家族建立在地聲望，更為四明地區創造了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形塑了四明的優勢。不過，到了韓侂胄執政之後，為壓制政敵，

興起黨禁，四明士人高文虎、高似孫父子投靠韓侂胄，攻擊道學家，四明士人遂由合而分。史彌遠當政之初，大規模招攬黨人，四明士人再度集結，成為真正具有優勢的政治團體。故有「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之說。然而，隨著宋與金、蒙關係的轉變，史彌遠的和戰政策不但引起朝廷的爭議，也引起袁燮的攻擊，從此二家關係由緊張而對立。袁燮父子對史彌遠、史嵩之二代的攻擊始終嚴苛，自然影響四明地區的和諧。其後，史彌遠擁立理宗、冤殺濟王，及史嵩之對蒙主和等，均引發更大的波瀾，竟至釀成政爭。此時，不僅四明其他士人，連史氏族人也要嚴加批評，或求退隱。此外，其他家族內部也紛擾不斷，均使地域發展呈現危機。因此，四明家族在南宋時期的發展，可以說是「成也政治，敗也政治」，四明的例子顯示，家族發展策略中致力鞏固的地方基礎仍然受到政治風波的穿透，無論婚姻、親屬或師友關係網絡，都可能受到動搖，換言之，四明士族人際或婚姻「網絡」所凝聚的集體力量與地域意識，在一波波政治風浪摧擊下，逐漸鬆動乃至解體。以致先前一體共榮的現象不見了，以詩社所反映的人際關係是由合而分，這和嘉定以來文化多面向發展的風尚相契合。但分立、對立，加上對科舉或參與朝政的冷漠，非但對舊有的個別家族的發展不利，對整體四明地區更是危機四伏。因此，從長時期變化去觀察四明地區個別家族乃至整體發展，都可以說在入元之前，舊家大族已逐漸由「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了。

(本文於 2008 年 11 月 17 日通過刊登)

(校對：黃怡君)

Politics, Regions, and Clans: The Decline of Scholarly Families in Ssu-ming during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

Kuan-chung Hu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cline of the elite families in Ssu-ming in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 as a case study of local society. In the Sung dynasty, the rise of a family depended greatly on its members' successes i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which gave them access to official appointments. Members with government positions promoted the juniors of their extended family and supported one another at court, thus forming a political force. To solidify their power, they advanced the family's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ir home region by asset management, and elevated its reputation by participation in local activities such as public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hilanthropy. Their philanthropy resulted in a local cooperative economic model, the "community's charitable estate" (*hsiang-chü i-chuang*). Through close inter-clan collaboration, elite families in Ssu-ming created a distinct local culture. In this sense, the rise of the elite families represented the rise of the Ssu-ming region. These close-knit families began to disintegrate, however, after their success in politics and scholarship culminated in the Chia-ting reign. The

disintegration was caused first by the political disputes that arose from Tao-hsueh prohibition in the Ch'ing-yuan period (the *Ch'ing-yuan tang-chin*), and then by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toward the Jurchen Chin in response to the threat of the Mongols. These political struggles divided families that had previously closely cooperated, and even gave rise to conflicts within families. The decline also had its internal causes in the shift of their younger generations' interests. Affluent life in a peaceful period made the families' children less motivated to prepare for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and instead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ward art,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Thes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contribut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Ssu-ming elite families at court and in their home region before the advent of the Yuan dynasty.

Keywords: Ming Chou (Ssu-ming), local culture, elite families, community's charitable estate (*hsiangchu yijuang*), Daoxue prohibition in the Chingyuan period (*Chingyuan dangjin*)